

制度分析视域下的 中国特色 政党制度研究

熊必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4003860

D665
20

本书获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制度分析视域下的 中国特色 政党制度研究

熊必军 著



D665
20



北航

C1691109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熊必军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17 - 1706 - 1

I. ① 制…

II. ① 熊…

III. ① 政党 - 政治制度 - 研究 - 中国

IV. ①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1069 号

制度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前 言

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近年已成为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中国政治》以及《政治学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社会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等期刊进行搜集后发现，刊载的论文近三百篇，相关学术著作近四十本。并且发现近年来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功能，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我国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参政党理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以及与当前一些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或指导意义研究等方面。纵观学术界及政界的研究，发现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文本形式不全面，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以历史归纳、文件解读或只讲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等口号式的、下结论式的研究，缺乏基础性的理论探索，而且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使得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的历史必然、历史意义及现实作用研究分析不够、评价不足，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创造性价值分析不足、评价不足，或对创造性价值研究不系统，没有从理论上予以充分地论证和说明！总是徘徊在对西方的政党制度理论评价体系中，或对传统文件解读之中，无法说明或解读中国特色政

党制度的理论与现实的创造性价值,同时对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对策性研究也比较缺乏实用性。

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①正如政党制度研究学者王邦佐教授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我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②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是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如刘宁宁著的《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③二是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率先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者是王邦佐教授。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他与李惠康教授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

① 此处参阅了黄福寿、刘建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②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③ 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

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①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尽管如此,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视角仍然比较单一,大多数还是以西方现代政治的研究方法或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方法作为评价分析标准来分析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二

所谓制度分析,是指考察制度的形成和它的变迁,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度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领域都可以追溯源头。^②

首先,政治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研究人类的政治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分离,二是从理念出发来进行演绎。亚里士多德打破柏拉图的研究特点,主张把伦理学和政治学分开,认为政治学是研究集体的善行,并在收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他研究城邦制度的根本性目的,是要探求什么政治制度最适合于、最有利于人类社会集体善行的发挥和推行。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③ 他还说:“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

^①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2页。

^② 此处参阅了郭小聪:《制度分析的方法论评价——兼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页。

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①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进行制度分析的出发点,是探索人类社会集体的善行,即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作为政治制度分析的首创者,亚里士多德的以集体(城邦制度)作为逻辑起点和分析单位的传统,影响至今,传统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更是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设计师。尽管二战以后,个体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研究热门,但很快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陷入绝境,因为行为主义政治学不能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行为会有决然不同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因为制度安排在作怪。而如今,制度分析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更是热门了。

其次,是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早期比较系统地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无疑是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和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变量,把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引入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建立了更为接近现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他们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

第三,社会学的制度分析。韦伯是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开创者,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和斯宾塞没有专门探讨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但都主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可以说,从方法论上看,在社会学的奠基时代,由于在认识上没有把自然与社会区别开来,因而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独特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延伸。韦伯对人类社会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分析,第一次使社会学有了自己独特的、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界制度分析的开创者,韦伯是非常独特的。他的制度分析方法论既不同于经济学、政治学界制度分析的早期学者,也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他认为社会科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个体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

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行为是集体行为的起点和原始动力,集体决策只不过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制度也是单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形式,个体是制度组织的基本元素,个体的性质是制度设计和变迁的依据。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个体与整体高度统一的方法论,与流行于西方学界的制度分析方法在价值观上的区别则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认为要分析人类社会的制度,必须先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所以确定人类历史的起点是十分必要的,主张从社会性、现实性来理解作为历史起点的个体,主张个体—集体—制度—社会的逻辑进程,即从个人到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到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至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最终揭示制度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制度分析研究方法是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辩证发展的及历史的视角来研究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作用。制度分析不是将制度及其运行视为一个孤立、抽象和现代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设计的机制,而是将其视为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是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天、地、人系统的一个有机链条。制度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植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既内在地体现和反映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存在,同时,又必然与社会、文化及历史环境中各种因素密切关联。正是在这种关联与互动过程中,呈现出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变迁的内在轨迹。在此意义上,制度分析的内核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有别于近代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强调历史分析、总体分析和人文传统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原则。^① 概而言之,制度分析框架必然包括结构分析、历史分析、跨学科分析、比较制度和跨文化的分析方法,惟有将这几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更全面地把握制度分析的内核及其方法论原则,才有可能更好地体现其方法论优势和在分析人类社会面临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挑战中的有特殊意义的价值取向。

一、结构分析法。结构分析法是通过分析和确立事物(或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联系方式进而认识事物(或系统)整体特性的一

^① 林义:《制度分析及其分析论意义》,《经济学家》2001年第4期。

种科学分析方法。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结构分析已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制度主义认为:“制度重要的前提是结构的重要性,结构实际上决定着行为。……制度主义的结构主义特征倾向于关注政治体系主要的制度特征。”^①

二、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就是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分析事物要把它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联系和比较,才能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有些矛盾或问题的出现,总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在分析和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只有追根溯源,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以历史分析为基本构架,把制度的变迁和现象的表层纳入纵向历史发展的更深层面,无疑使我们得以明晰制度演进的内在脉络和揭示在特定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下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对于各国探索自身历史设定中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特殊的方法论价值。历史分析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促使更多的社会科学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自身的历史进程和制度环境,关注对适合各国国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

三、跨学科研究分析法。跨学科研究分析法就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于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潜意识等深层隐性制度因素的内在关联中,揭示制度变迁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内在制约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同时有助于在广阔的制度背景下,提供更全面系统、更有洞见的分析结论,为揭示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内在规律,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分析结论。

四、跨文化研究分析法。跨文化研究就是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西方

^① (美)盖伊·彼特斯:《制度主义:新与旧》,载于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5页。

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在此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人们通常以西方便现代化的标准去评价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加上分析层面主要局限于经济技术机制,忽略制度研究,更是相当忽略对遮蔽在制度背后深层文化因素的研究。制度分析既有历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传统,无疑会促使人们对处于隐性状态的文化发展、观念习俗、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等给予深切地关注。跨文化的制度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对异质文化环境下制度变迁分析的背景中,更清晰地发现和把握自身文化设定和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经济制度、交换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乃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制度分析无疑为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迥然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变迁轨迹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反映中国制度变迁内在演化规律的中国政治学,提供“逆转思维传统方向”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制度分析区别于其他方法论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整体分析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探索制度的变迁轨迹和社会活动的内在制约因素。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制度分析研究方法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方法的启示是:制度分析所强调的研究方法论原则更有助于从各种制度、各个学科及不同研究对象的交织点,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外观,更好地揭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内在本质;有助于分析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创造性价值;更有助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回应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适应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时,在坚持中,如何完善地实践创新。正因如此,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多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改革 20 多年来的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文献为指导,尝试从不同学科的不同理论视角,以制度分析为研究工具,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理论、制度效率理论、制度设计理论、各种民主理论、现代化理论、合作理论等,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外对比

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进行一些突破性的研究,以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或思考,来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

三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称谓,在理论界却是一个存在争议、使用混乱的概念。目前我国理论界主要有几种称谓: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制度(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界的称谓)、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称谓)、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多党合作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等。

在这些称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该说是比较正式、比较完整的概念,因为中国政党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必然包括密切关联的三大要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多党合作,三是政治协商。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所在,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多党合作”是中国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但多党合作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政治前提,以政治协商为合作方式;“政治协商”是中国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是独立的政党,各民主党派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也不是变相的一个部门。

总之,只有把上述三大要素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只有理解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条件与活动方式,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多党合作与其他国家的联合执政的区别及其特色;忽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导致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片面理解。但是为了方便使用,又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特色,并且为了方便日后不排除台湾的政党及政党制度和“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港澳”的政党及政党制度,所以尽管本书是由已经在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组成,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称谓作一个统一,简称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全书以制度分析为研究工具,分七个部分:第一章是新制度经济学理

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2005 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特别强调了是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本章主要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效率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适应中国国情,社会发展的制度产生与变迁、制度结构、制度效率做一些分析。

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地生根发芽,并成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种政党制度,源于它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匹配、协调、融合的制度均衡状态,而其他政党制度的失败则恰恰与之相反。从 1980 年至今,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逐步完善与发展的时期,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社会的迅速变革,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根据诺斯的国家理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又是经济衰退的原因。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界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或规则,而政治规则就是国家界定的基本规则之一,政党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可以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改革诉求,整合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智慧和力量,形成—种强大的发展共识,通过大众对现状的认同和增强各级政府机构的凝聚力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这种强大共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改变人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人民对改革开放的自主参与性和积极性。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是整合和增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和动力,达成—种强大的发展共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反映了该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则构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安排。它的制度结构为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了一种保障,是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政党制度,体现该项制度结构的社会效率性。它的制度安排为众多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了能够表达他们各自利益和观点的—种程序,—种舞

台,一种论坛,人民群众都可以公正、平等地通过参政议政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了保障,体现了该项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合法性及现实性。

第二章是制度设计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已经适应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确立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模式,产生了很好的制度效率,是不需要改变的。但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及人的有限理性要求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主要是通过加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安排的制度设计,来完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安排,强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适应性,提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适应性效率,以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环境,克服我们的局限性,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因此,本章主要从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制度设计视角出发,来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制度设计的原则和要求,制度设计的路径等,认为:人类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才能预防和弥补自身理性的不足。而且正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再加上国内外环境复杂,以及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必须通过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克服人在决策中的有限理性及应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些重要政治制度准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团结合作中形成的政治共识,是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进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设计时,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而科学性、普适性、效率性、激励性、协调性等原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遵守的普遍原则。因为完整的制度设计可以向人们提供一整套较为明确的信息,可以激发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使其转化为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

为人们的行为选择设立了一个合理的空间,进而借助于奖惩机制,不断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双向的奖惩,从而对政治行为选择进行引导。所以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进行制度设计时,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的框架构想,从理念、制度、组织的三个角度进行制度设计的路径设想,从理念化、制度化、程序化三个过程进行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应对措施思考。

第三章是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视角,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救亡图存”式的现代化模式,发挥了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作用的独特性进行研究。政党政治的兴起,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据统计,目前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治理形式,是现代化和现代政治的产物,政党的出现是政治现代化的要求。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或研究者都把政党与民主联系在一起,认为“政党的出现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但我们看到不仅仅在民主的国家,在威权国家,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政党都是一样地出现和存在,所以可以说政党和民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并不是等同的,但说政党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没有异议的。因此,本章从现代化视域的角度,运用一些政党现代化的理论,通过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相互促进的关系,来探索当前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通过加强政党建设,提升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强化民主建设,增强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民主性;完善制度设计,建构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法治性;扩大参与途径,提高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性等,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即政党现代化,同时又适应并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第四章是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社会学中的制度分析认为,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行为是集体行为的起点和原始动力,集体决策只不过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制度也是单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形式,个体是制度组织的基本元素,个体的性质是制度设计和变迁的依据。而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由于个体人和“社会

人”的主体性同时加强,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或分化程度的提高,社会整合力增强,个体的存在发展受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个性的发展,尤其是主体意识的增强,个体人更加试图摆脱社会的压力,追求愈来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行动上的更大的自主性。这两种力量的强化,必然使两者整合协调的难度增大,冲突明显。作为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整合,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①因而如何实现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有效整合,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选择问题就成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坚持与完善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现实和理论问题。同时社会学领域中的合作主义强调社会和谐和合作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如何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制度安排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本章主要运用了社会学领域中社会选择理论、合作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进行一些研究与思考。

第五章是民主理论视域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民主,特别是现代民主,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而也产生了许多民主政治理论学派。因此,本章运用了票决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等来审视和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主体、观念、利益、冲突等领域的多元特征,对于联系社会各阶层、反映多方利益的政协制度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而协商民主注重民主的实质,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利益,谋求社会和谐。因此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人民政协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是在反思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复兴起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主张通过公民的讨论、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而在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中,政治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6日版。

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主体、观念、利益、冲突等领域的社会多元特征，对于如何广泛地联系社会各阶层，体现最广泛的民主，反映多方利益的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制度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因此，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人民政协制度界别的设置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六章是合作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存在着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的创造性价值分析不足、评价不足，没有从理论上予以充分地论证和说明！所以本章试图运用合作理论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进行研究，以期提出一些新理论观点或思考，来推进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

本章认为西方政党制度研究的主流是以竞争型政党制度研究为主，其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人性基础是性恶论，文化基因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一个文化特征就是竞争，所以在政党体制中的表现，竞争是主题。

在中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人性基础是性善论，其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就是合作，所以在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合作是主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创设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类型，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制度典范。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一党执政、多党参与，打破了一党执政、无任何其他政党存在，或一党执政、一党或多党在野反对的一党独自执政形式；要么是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轮流执政形式，以及多党联合执政的形式。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创新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

协商的过程。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完善了世界民主除票决民主之外的其他民主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克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人大的票决民主,政协的协商民主、参与民主(也包括其他领域如基层社区等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等)使得我国成为民主形式发展比较完善的民主政治国家。

第七章是立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就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合作型政党制度已成功地在中国实践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很多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者(除了西方政党制度研究者之外,还有很多国内的学者)却总是拿着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来研究评判它,这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不相符,或者是忽视文化的差异、国家的差别、民主形式的多样性等,因此,我们更有责任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要想构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学者或政党制度研究专家需要一反以“竞争”为主线的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框架,转向以“合作”为主线,立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建“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即揭示人类政党政治中合作行为或规律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评价体系。